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23年6月19日至7月14日

议程项目2和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

以及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伤亡记录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影响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概要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0/11 号决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了一份关于伤亡记录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影响的综合报告。报告对于政府、联合国、民间社会、人道主义组织和其他方面如何利用伤亡记录洞察和分析武装冲突和暴力局势的关键方面作了说明。伤亡记录对保护、遵守国际法、预警、预防、问责、获得服务和赔偿等都有影响。由于伤亡记录包含事实背景、行为体和方法的多方面信息，可以成为暴力和冲突应对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进一步支持这项工作，以协助制止或减轻对平民和受害者的伤害，确保辨认所有伤亡人员，记录他们的命运和下落，使遗体得到妥善处理，并按照他们的习俗归还其家人。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一. 导言

1. 人权理事会第 50/11 号决议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编写一份关于伤亡记录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影响的综合报告。
2. 在编写本报告时,人权高专办受益于各国、联合国实体,包括参与伤亡记录工作的联合国特派团和外地机构、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尤其是“所有伤亡统计组织”协调的“伤亡记录网络”的成员)、学术界和独立专家的合作和投入。50 多名多年来一直在记录各种背景和艰难环境下的伤亡情况的受访者提交了资料。¹
3. 人权高专办在审查提交的资料时,力求突出显示伤亡记录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对保护人权的积极影响的实例。² 人权高专办收到了一系列实体提交的资料,这些实体采用各种方法记录伤亡情况。凡为本报告提供信息的实体以透明的方式阐述了其方法、目标和范围的,本报告纳入了其工作实例,即使这些实例没有充分反映人权高专办的方法。
4. 伤亡记录是实现一系列基本人权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所列举的例子说明了伤亡记录对人权的各种影响,无论是对受害者个人和家庭,还是在社区一级。影响体现在生命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和有效补救权等方面。伤亡记录可以促进旨在获取食物、保护弱势群体、预防、问责和行动自由的措施,也可以用于确定伤害的模式,并揭示对人权产生最不利影响的行为。
5. 伤亡记录提供关于个人的信息,并有利于对个案进行跟踪,同时也可以作为了解更广泛情况和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证据基础。记录往往是实时进行的,所产生的信息向公众开放,被一系列行为体,包括当地社区、民间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武装行为体、有关机关、联合国和外交界用于在多个层面为决策提供信息。除其他外,这些分析和信息被用于指导保护平民和确保平民享有权利的努力,以及防止和在某些情况下处理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行为。
6. 伤亡记录工作并非新鲜事物。在联合国内部,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于 2007 年建立了历时最长的系统。自那时以来,联合国伤亡记录系统在冲突和非冲突局势中,在国内和远程,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马里、索马里、南苏丹、乌克兰、也门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等地运行。2019 年 12 月,人权高专办基于作为开展伤亡记录的联合国实体具有的独特经验以及其他从业人员的经验,发布了《伤亡记录指南》。³ 伤亡记录也有助于人权高专办参与安全理事会的《保护平民议程》,并有助于高专办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冲突相关死亡的具体目标(16.1.2)的监管机构开展工作。
7. 联合国以外的许多行为体也进行伤亡记录。在本报告中,人权高专办承认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伤亡记录工作的广度,但报告仅能涵盖部分内容。人权高专办对这方面开展的工作表示感谢。

¹ 人权高专办,“征求意见:关于‘伤亡记录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性’的综合报告”。

² 约 6 份资料来自各国(阿塞拜疆、布隆迪、克罗地亚、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卡塔尔),1 份来自智利国家人权机构,1 份来自智利儿童问题监察员,18 份来自联合国实体,25 份来自民间社会组织、学术界或独立专家。

³ 人权高专办,《伤亡记录指南》(2019 年,日内瓦)。

二. 什么是伤亡记录？

8. 人权高专办将伤亡记录定义为有系统地收集和核实关于个人死亡的信息，有时还包括在暴力情况下，例如动乱和危机以及武装冲突中受伤的信息。⁴ 伤亡记录的目的地不一定要确定伤亡的原因是否合法。然而，就个别案件收集的信息以及对伤亡的总体分析有可能显示发生了侵权行为，包括指出伤亡的严重性和规模。伤亡记录系统可以针对特定地点、时间段、事件类型和伤亡类型。这类系统通常在一段时间内运作，力求做到综合全面。根据《伤亡记录指南》，收集的信息必须表明伤亡属于该系统的范围，并且必须包括每起伤亡的独特信息，通常是个人身份信息。⁵ 公开的汇总数据和分析应当包括死亡或受伤的地点、日期和情况、死亡或受伤的人数、死亡原因、造成死亡或受伤的行为者以及其他信息。⁶ 每一项记录工作在具体方式、范围、可用资源和以相关信息促进人权的预期用途方面可能有所不同。联合国以外的伤亡记录人员采用的方法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这也反映出能力和资源上的差异。

9. 根据人权高专办的经验，伤亡记录在下列情况下最为有效：

(a) 基于透明和可靠的方法，确保数据准确可靠，用户能够发现数据的潜在弱点和局限性；

(b) 一贯、系统和不带偏见地进行；

(c) 利用多个独立的信息来源，并评估每个来源的可信度和可靠性；

(d) 具备审查信息的内部质量控制程序；

(e) 用多种来源核证信息，并采用“证据标准”评估经核实的信息；⁷

(f) 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公布；

(g) 将伤亡分析与更广泛的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问题联系起来。

10. 一致和透明的记录方法对于生成可靠的信息并确保其他人可以使用这些信息至关重要。借助这种记录可以进行跨时间和跨变量的比较，如国家一级以下的地区、死因和行为者属性的比较。在严格核查要求下产生的伤亡数字往往是最低数字，实际死亡或受伤人数可能更高。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在应用于经常以缺乏信任、信息错误或两者兼而有之为特征的环境时，可能会使独立的伤亡记录成为为数不多的可靠信息来源之一。

三. 伤亡记录对人权的影响

11. 伤亡记录的一个关键属性是，提供以受害者为中心、以事实为基础的长期信息。在动荡的环境中，关于局势和行为体往往有相互矛盾的说法和不同的信息，

⁴ 伤亡记录应区别于“伤亡跟踪”，后者通常在军事结构内进行，为战术和行动提供信息并减轻对平民的伤害，见人权高专办，《伤亡记录指南》，第9页。

⁵ 同上。

⁶ 同上，第26页。

⁷ 人权高专办使用的伤亡记录证据标准是“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见人权高专办，《伤亡记录指南》，第31页。

独立收集的基于可靠方法的伤亡记录能防止或揭露虚假信息，提高透明度，同时提供准确和客观的信息。因此，伤亡记录可以作为知情和有效决策的基础，甚至可以作为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一个交汇点。

12. 伤亡记录有助于决策者、人权维护者、人道主义行为者和其他人制定适当的对策，应对武装冲突期间平民受到的伤害和暴力期间人们受到的威胁。伤亡记录的分类信息，例如按年龄、性别、武器类型或地理位置分类的信息，有助于进行多种类型和层次的分析。

13. 伤亡记录有效地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类为暴力承受的代价上。伤亡记录确定了受影响最大或风险最大的群体和社区；揭示围绕选举等具体事件的暴力程度，并表明其他地方或在未来发生类似暴力的风险。伤亡记录列出各区域的不同影响；展示冲突动态的趋势和模式或突出其中不为人知的方面；引发问责和救济调查；并且可以揭示关于各参与方的行为的信息，包括跨越时间和地区的这类信息。引用伤亡记录数据的报告经常引起媒体的大量报道，并被国际新闻机构采用。

14. 伤亡记录还有助于衡量关于和平、正义和强有力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的进展情况。具体而言，伤亡记录是关于冲突相关死亡的指标 16.1.2 和关于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工会成员遭受杀害和其他袭击的指标 16.10.1 的信息来源，人权高专办是这些指标的经管人，并发布年度数字。

15. 下面的实例突出了伤亡记录对人权的不同影响。虽然这些例证被分成不同的类别，但许多都与一个以上的类别相关，很少单纯属于一个单一的标题下。⁸

A. 预警、预防和保护

16. 以下例子说明了伤亡记录如何在多种情况和多种层面上促进预防和保护。例如，查明的伤亡高峰被用作预警的“警报信号”，触发保护受影响者和风险最大者的行动。这种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应对实地的紧急需求，对多项人权，特别是生命权产生积极影响。

17. 克罗地亚在资料中提到，在 1991 年战争初期发生一些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后，伤亡人数居高不下并且不断增加，这有助于了解暴力的程度和动态，推动国际社会进行政治参与，减少冲突升级，最终导致签署了“萨拉热窝停战协定”。⁹

18.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人权司的伤亡信息，以及关于联合国部队巡逻的数据集，为确定需要增加联合国巡逻和临时行动基地的实时预警信号和关键热点提供了证据基础。¹⁰

19.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使用伤亡分析发挥了类似作用，包括通过部署联合国部队、开放基地和在关键地点部署巡逻队以及在打击武装团体的联合或单

⁸ 并非报告中描述的所有伤亡记录举措都在进行中。伤亡记录工作取决于若干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包括事实背景和可用资源。

⁹ 1992 年 1 月 2 日的停战协定又称为“万斯计划”或“执行协定”，由此部署了联合国保护部队。

¹⁰ 南苏丹特派团应对热点的措施详情见 S/2022/689，第 56-59 段。

边行动中实施人身保护。例如，2022 年 6 月，在武装分子于 Ouanda Djallé 发动袭击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开设了一个临时行动基地，以便增加该地区的巡逻，帮助确保平民的安全环境。

20. 2014 年 8 月袭击事件后，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人权办公室的伤亡数字在新闻稿和公开报告中被用于就辛贾尔的局势报警，该次袭击标志着达伊沙开始对雅兹迪人进行种族灭绝。¹¹

21. 联伊援助团人权办公室还记录了 2019 年大规模示威期间数百名抗议者死亡，数千人受伤的情况。特派团在后续工作中利用数据显示有害的武力模式，导致在随后的示威中直接向示威者发射实弹和催泪弹的情况大幅减少，并改善了安全部队保持克制的总体努力。较长期的影响包括伊拉克政府成立了执法部队局，负责人群控制、培训和装备(警棍和身体保护)。以前不存在这样的机关。

22. 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联索援助团)将记录信息用于汇编行为体、弱势个人和风险群体的概况图，以此预测不同形式的侵犯和虐待行为，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可能会在何处加剧。这些信息还被用来突出军事行动中的伤亡趋势，如政府军和当地部族开展的联合军事攻势，以及青年党作为回应而发动袭击的数量和致命性趋势。

23. 民间社会组织也利用伤亡记录促进保护。拯救儿童联盟分析了多个国家、联合国实体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多场冲突的全面伤亡记录，以确定爆炸性武器对儿童的具体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地雷和未爆弹药造成的大量伤亡编写了第一本儿童爆炸伤实地手册。¹² 该手册为在冲突环境中治疗严重受伤儿童方面几乎没有经验或培训的医务人员提供了指导。

24. 在与保护直接有关的另一个例子中，欧洲庇护支助办公室利用伊拉克死亡统计机构的伤亡记录评估伊拉克的安全局势，以确定国际保护状况。¹³ 诸如“数字数据库安全”¹⁴ 和“援助人员安全数据库”¹⁵ 等举措跟踪影响人道工作的安全事件，帮助人道救援人员更好地了解不稳定的安全环境并做好准备。例如，它们发出警报并提供数据和分析，向人道部门通报安全环境中发现的关键事件、具有统计意义的趋势、变化或异常值，为安全风险评估提供信息。¹⁶ “不安全透

¹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认定，达伊沙对雅兹迪人犯下了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会议室文件，题为“‘他们为毁灭而来’：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犯下的罪行”，可查阅人权高专办网页(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ici-syria/documentation)。

¹² Steve Bree and others, *Paediatric Blast Injury Field Manual* (London, Paediatric Blast Injury Partnership and Save the Children, 2019).

¹³ European Asylum Support Office, “Country of origin information: Iraq security situation (supplement) – Iraq Body Count – civilian deaths 2012, 2017–2018” (2019).

¹⁴ Insecurity Insight, “The SiND”.

¹⁵ Aid Worker Security Database, “About the data”.

¹⁶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 年 8 月 12 日，全球危机加剧，2021 年有 140 多名援助人员丧生)、欧洲联盟委员会(2020 年 8 月 18 日，高级代表/副总统约瑟夫·博雷尔和危机管理专员雅奈兹·莱纳尔契奇在 2020 年世界人道主义日发表的声明)和联合国大会(第 75/125 号决议)都引用了《援助人员安全报告》。

视”关于尼日利亚和南苏丹被害卫生工作者人数的文件有助于为在那里工作的卫生工作者制定缓解措施，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保护当地居民的健康权。

B. 遵守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法

25. 伤亡记录人员还收集表明可能发生了侵犯和践踏国际人权或人道法行为的信息。除了纪律和问责措施之外，此类信息还可用于促进遵守国际法，包括为此改变做法和行为并加强培训。

26. 萨尔瓦多在提交的材料中介绍了从伤亡跟踪入手对安全部队进行人权培训的情况。经国家公共安全学院制定的警察课程现在包括“人权和适用法律”，而军事课程除国际人道法外，还包括关于人权和使用武力的常设培训。

27. 2022 年，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人权司与国家警察和军队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提出了伤亡记录中出现的涉嫌侵权案件，并敦促采取适当的纪律和司法措施。特派团人权司还向警察、军队和民间社会成员提供培训。

28. 伤亡记录促使武装冲突各方改变行为。例如，在阿富汗，在联阿援助团(部分基于其伤亡记录)的倡导下，并针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造成平民伤亡的指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 2008 年设立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阿富汗平民伤亡跟踪小组。联阿援助团和平民伤亡追踪小组共同努力澄清平民死亡的情况。阿富汗有关部门在 2012 年建立了类似的跟踪小组。¹⁷ 2017 年 10 月，阿富汗政府批准了一项关于预防和减轻平民伤亡的国家政策及其实施计划。同样在 2017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用于跟踪与冲突有关的平民伤亡情况。

29. 自 2014 年以来，乌克兰人权监察团一直在全面记录平民伤亡情况并公开报告。其伤亡记录使国际社会能够充分和及时地了解冲突造成的损失范围和规模。伤亡记录也促进了调查，使监察团能够记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30. 2022 年，人权高专办驻也门办事处记录了导致平民伤亡的冲突相关暴力事件。这些信息包括死亡原因(例如地雷和未爆弹药、空袭和地面交战中使用爆炸性武器)和性质。对 2022 年 4 月至 10 月的停战期间以及直至 2022 年底的伤亡记录分析显示，沙特领导的联盟暂停空袭和减少使用爆炸性武器导致平民伤亡大幅减少。然而，胡塞运动战斗人员狙击手射击造成的平民伤亡没有减少，他们的短程无人驾驶飞机袭击有所增加。地雷和未爆弹药造成的平民伤亡持续存在。进一步调查表明，许多事件相当于违反国际人道法，各方未能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平民伤亡。人权高专办定期公布平民伤亡数字，并与各方接触，倡导改进对国际义务的遵守。

31. 在海地，联合国伤亡记录显示，2022 年至少有 160 名囚犯死亡。这促使人权高专办进行调查，调查显示，死亡是由拘留条件造成的，包括食物、水、药品和卫生设施持续不足，部分原因是帮派暴力阻碍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根据这些文件，包括人权高专办在内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国家和国际利益攸关方发出呼吁，要求让该国的监狱接收食物和药品供应，以保护囚犯的生命权。

¹⁷ 联阿援助团和人权高专办，《阿富汗：2012 年年度报告——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2013 年，喀布尔)。

32. 在伊拉克，联伊援助团的伤亡数据显示，2017年3月，美国领导的联军轰炸了摩苏尔 Al-Jadida 地区的一座建筑，造成 100 多名平民死亡。随后，该联盟承认“美国的空袭在 3 月 17 日的袭击中发挥了作用”。¹⁸ 从这一事件中吸取的教训导致美国领导的部队调整程序，目的是减少摩苏尔战斗中的平民伤亡。¹⁹

33. 2015 年，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特派团平民伤亡跟踪、分析和应对小组开始运作，2022 年，安全理事会要求特派团与国家权力机构分享其跟踪行动的经验教训，以支持制定索马里平民伤亡监测、缓解和预防政策和机制。²⁰

34. 民间社会组织也致力于利用伤亡记录对进一步遵守国际人权和人道法产生影响。菲律宾大学第三世界研究中心是许多例子之一，该中心记录并公开传播关于该国安全部队涉毒杀戮的信息，并倡导遵守国际人权法。²¹

C. 问责

35. 伤亡记录有助于各国履行义务，通过指出可能发生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行为的事件，调查有关违反和践踏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的指控。这可能会促使采取进一步行动，并加强问责。

36. 在南苏丹，2022 年，南苏丹特派团记录了 42 名平民在瓦拉布州被杀害，主要是被法外处决，就此优先与国家和州两级主管部门接触，以确保停止处决，敦促进行调查，确保将犯罪人绳之以法。

37.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抗议活动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沿以色列边界对加沙抗议者使用武力的情况时，使用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数个来源的伤亡数据。²² 委员会的公开报告列出了死者的详细分类记录，包括受害者的姓名、年龄、隶属关系、身份以及死亡日期、时间和方式，并向国际和国家问责机制通报了记录。

38. 伤亡记录还被用于支持联合国促进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所犯罪行问责调查组(联伊调查组)的问责工作。联伊援助团的伤亡记录记录了 2014 年 6 月在 Speicher 营地和 Badush 监狱数百人被杀以及针对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事件，该记录被用作联伊调查组调查这些事件的依据。

¹⁸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raq, the battle for Mosul” (citing Michael R. Gordon, “New ISIS tactic: gather Mosul’s civilians, then lure an airstrike”, 纽约时报, 2017 年 3 月 30 日)。见 Tara Copp, “US-led coalition adjusts tactics to counter Islamic State forcing civilians into targeted buildings”, 《星条旗报》，2017 年 3 月 30 日。

¹⁹ 同上。

²⁰ 安全理事会第 2628 号决议(2022 年)，第 11 段。

²¹ 定期的信息图表显示了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涉毒杀戮情况(<https://twitter.com/DahasPH>)。美国国务院的报告(美国国务院, 2021 年国家人权实践报告: 菲律宾(2021 年))、人权高专办的报告(A/HRC/44/22, 第 19 段)和人权观察(人权观察, “2022 年菲律宾事件”)以及各种媒体渠道采用了这些数据, 以提高对禁毒战争的人类代价和尊重人权的必要性的认识。

²² 见载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抗议活动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详细调查结果的会议室文件, 可在人权高专办网页上查阅(www.ohchr.org/en/hr-bodies/hrc/co-iopt/opt)。

39. 此外，自 2014 年以来，美国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的内部调查有 70% 以上是基于 Airwars 公司提交的伤亡记录。²³

40.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民间社会组织的伤亡记录有助于国际和国家调查委员会、国际法院和联合国的工作。具体而言，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和调查委员会使用了人权组织 B'Tselem 的伤亡记录，²⁴ 使用 Iraq Body Count 伤亡记录的有国际刑事法庭，²⁵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016 年对伊拉克的调查²⁶ 和联伊援助团人权办公室。²⁷

D. 爆炸性弹药和武器的防护

41. 对生命权、健康权和行动自由权最直接和最积极的影响之一，是在清除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和其他未爆弹药的行动中使用伤亡记录信息。记录死亡和受伤的原因以及受害者的位置、日期、年龄和性别等信息，为有能力做出反应的人提供了重要信息。

42. 在也门，人权高专办的伤亡记录显示，在地雷和未爆弹药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四分之三，其中主要是男童，并注明了事件发生的地点。调查结果被用来提醒各方，根据国际法，它们有义务记录、标记和清除其控制下地区的地雷，并特别注意尽量减少地雷的滥杀滥伤作用。

43. 在索马里，联索援助团利用伤亡记录信息分析青年党使用的简易爆炸装置的影响，²⁸ 提供了关于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的类型、使用方法和地点的信息和统计数据，以及谁在何时受到影响的细节，并进行跨时段的比较分析。分析尤其确定这种袭击已成为残疾的一个重要原因，突出表明需要优先重视和加强在索马里落实健康权和残疾人权利。这一分析还为该国国家残疾人机构的工作提供了信息，该机构扩大了与简易爆炸装置有关的研究和宣传能力。

44. 地雷行动处及其在地雷行动责任领域的合作伙伴收集和使用受地雷、简易爆炸装置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个人伤亡数字。对爆炸物伤亡数据的分析有助于确定地雷行动的活动优先次序(风险教育、清除和受害者援助)，有助于监测联合国地雷行动战略的进展，并促进在与条约有关的论坛上向会员国宣传更好地执行

²³ 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 –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Public Affairs Office, “Civilian casualty assessment”, 10 March 2022.

²⁴ A/HRC/12/48, 第 181、第 185、第 352、第 353 和 357 段；A/HRC/29/52, 第 37、第 69 和 70 段。

²⁵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利用 Iraq Body Count 的数字评估 2003 年 3 月至 5 月军事行动期间的伤亡总数，以确定所指控的战争罪的严重程度(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对所收到关于伊拉克的来文的答复，2006 年 2 月 9 日，第 6 页)。

²⁶ United Kingdom, *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Privy Counsellors: the Report of the Iraq Inquiry – Volume XII* (London, 2016), paras. 53, 103, 203, 220, 227, 238, 244–246 and 272.

²⁷ 联伊援助团人权办公室和人权高专办，《2010 年伊拉克人权报告》(巴格达，2011 年)，第 iii、第 3 和第 10 页。

²⁸ 联索援助团和人权高专办，“动摇索马里和平、安全和人权的基础：青年党使用简易爆炸装置——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残疾人权利公约》和《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²⁹

45. 在阿富汗，“制止武装暴力行动组织”汇编并分析了联阿援助团制作的伤亡记录，其中显示，2016年至2020年期间，空袭造成的所有平民死亡中有37%是儿童。

46. 伤亡数据还被用来确定爆炸性武器在居民区对不同人口群体造成伤害的模式，³⁰而“制止武装暴力行动组织”则利用伤亡数据评估《武器贸易条约》在减少爆炸性武器造成的平民伤亡方面的有效性。³¹

47. 这些信息为支持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和各国的宣传提供了证据，以加强保护平民免受人口居住区爆炸性武器的伤害，最终通过了《关于加强保护平民免受在人口居住区使用爆炸性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的政治宣言》。

E. 人道主义应急

48. 伤亡数据为根据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支持人道需求分析、应急规划和方案编制提供了证据基础。这些数据使人道援助界能够提供更知情和准备更充分的行动，力争拯救生命、确保安全和安保、减轻痛苦和恢复人的尊严。

49. 2023年，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在年度人道需求概览以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和也门的人道应急计划中采用了联合国实体提供的平民伤亡记录信息。按地点、性别和年龄分列的伤亡数字支持侧重于减轻平民伤亡风险的应对活动，例如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伤亡。

50. 在索马里，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采用了联索援助团人权和保护小组根据伤亡趋势分析于2022年制定的保护平民指导说明。该说明是人道主义行为体在索马里就保护平民问题通报情况和做出反应的第一份此类说明。

51.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2023年和2024年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主要基于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提供的伤亡数据和信息。同样，在南苏丹，南苏丹特派团向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保护专题组提供伤亡数据，包括通过人道需求概览为编制方案提供信息。

52. 民间社会组织也利用伤亡信息确定人道需求，并提供有针对性的人道援助。例如，在邦特兰和索马里西南部运作的 Omeria 社区发展组织利用伤亡记录确定最需要帮助的幸存者，包括寡妇、孤儿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并向他们提供资金援助。

²⁹ 地雷行动处，“联合国地雷行动战略互动看板”。

³⁰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爆炸性武器在人口密集地区的性别影响”，概况介绍。

³¹ Jennifer Dathan, *Explosive Weapons and the Arms Trade Treaty: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rms Trade Treaty on Reducing Civilian Harm from Conventional Explosive Weapons* (London, Action on Armed Violence, 2023).

F. 政治接触和宣传

53. 伤亡记录能够基于所造成(平民)伤害的范围、规模和严重程度提供证据,为在多种情况下推进关于人权的谈判、宣传和接触提供信息。

54. 2019年,联阿援助团报告说,其伤亡记录达到了10万人死亡的严峻门槛。³²人权高专办于2022年6月向人权理事会报告说,根据对平民伤亡数据的分析,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过去10年的冲突中,有30多万平民死亡。³³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当暴力或武装冲突升级时,人权高专办向人道协调厅通报死亡数字,以便纳入人道主义警报、最新消息、情况报告和类似项目。联合国高级官员,包括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派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个人代表,在暴力或武装冲突升级期间,将人权高专办和人道协调厅每日公布的伤亡记录信息作为与双方接触的基础。人道协调厅制作的“人道主义快照”利用人权高专办的伤亡信息,直观地描述了2014年冲突期间每个家庭和每个事件的死亡人数。³⁴类似这样的伤亡信息和图表让人对灾难的规模和程度感到震撼,促使从地方到国际各级采取行动,开展宣传和进行接触,以促成必要的变化。

55. 在联合国内部,旨在减少平民伤害的跨支柱讨论在议事中经常提到伤亡记录信息。秘书长关于保护平民的年度报告也依赖人权高专办的伤亡记录信息,通过提供相关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关于世界各地冲突中平民死亡的信息,将注意力集中在平民伤亡上。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6.1.2的监管机构,人权高专办通过记录与冲突有关的死亡,为秘书长在整个联合国的报告和宣传工作提供了实质性的分析基础。2022年,有16,988名平民在12次武装冲突中死亡。这一数字比2021年增加了53%,是自2015年通过《2030年议程》以来的首次增长。³⁵

56. 防止灭绝种族罪和保护责任办公室在关于全球预防暴行的宣传工作中,利用伤亡记录提出循证论据。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经常在公开声明中列举这类证据,并借以说明暴行罪的风险因素和指标。³⁶

57. 平民保护问题非正式专家组³⁷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工作级论坛,经常使用伤亡信息推进安理会的保护议程。伤亡信息还出现在许多国别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286(2016)号决议提交的关于攻击卫生工作者等行为的报告以及多种分析产品中。

³² 联阿援助团,“阿富汗:连续第六年有10,000名平民伤亡”,2020年2月22日。

³³ 许多叙利亚民间社会组织的伤亡记录工作使得统计估计数成为可能。见人权高专办,“联合国人权办事处估计,在叙利亚冲突的10年中,超过306,000名平民被杀害”,2022年6月28日。

³⁴ “截至8月24日,至少有142个家庭在同一事件中失去了三名或三名以上的家庭成员,共有739名平民死亡”(人道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加沙紧急人道主义快照(截至2014年8月25日8:00)”,2014年8月26日)。

³⁵ 即将发表的秘书长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2023年)和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报告(2023年)。

³⁶ 防止灭绝种族和保护责任办公室,《暴行罪分析框架:预防工具》(2014年,纽约)。

³⁷ 安全理事会报告,“事后思考:保护平民问题非正式专家组”,2016年7月29日。

58. 作为定期报告的一部分，伤亡记录在长期使用时也是有效的。乌克兰人权监察团每周和每月发布的平民伤亡最新情况，使用按性别、年龄、地理区域和死因分列的数据，反映了持续暴力的规模。其中包括每周当时的统计数据 and 自 2014 年以来的累计数据，以及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联邦武装袭击乌克兰以来的累计数据。

59. 联索援助团向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察和报告机制提供信息，还在不同的协调、提高认识和决策论坛中使用儿童伤亡信息。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利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测和报告机制提供的信息，就发生的侵害儿童行为得出结论。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整理了这些信息，在附件中列出严重侵害儿童包括杀害和残害儿童的肇事方。

60. 2022 年，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向各国通报了伤亡数据，以提供背景情况，并为解决和预防冲突论坛的讨论提供信息，如卢安达和亚的斯亚贝巴首脑会议。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武装袭击之前，围绕明斯克安排执行情况的讨论经常提到来自乌克兰人权监察团的平民伤亡数据。

61. 国际移民组织的失踪移民项目记录在移民过程中死亡的人。国际移民组织收集的数据有多种用途，包括突显责任承担者未能履行国际承诺的情况，帮助家庭了解失踪亲属的命运，以及查明最危险的地区和迁徙路线。

62. 民间社会组织在宣传中也经常使用伤亡记录显示冲突造成的人员损失。例如，联合王国议会 2013 年决定拒绝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并随后承认了那里的失误，据报道，这是受到了 Iraq Body Count 等组织强调指出的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高的影响。³⁸

63. 同样，Tigray War Project 的伤亡记录被用于倡导在人权理事会设立埃塞俄比亚问题国际人权专家委员会。³⁹ 该组织的伤亡记录也为联合王国关于埃塞俄比亚冲突的议会辩论提供了信息⁴⁰ 并经常被国际新闻媒体引用。

64. Airwars 报告称，经过多年的宣传和参与，部分基于该组织对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伤亡情况的调查结果，美国国防部于 2022 年 8 月发布了《减轻和应对平民伤害行动计划》。⁴¹ 该计划旨在减轻和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其中包括基于伤亡记录评估结果的若干建议。⁴²

³⁸ Iraq Body Count 提交的资料，第 7 页。

³⁹ The Tigray War Project (Ghent University) 和 Every Casualty Counts, 第 2 页。

⁴⁰ 英国议会，“Conflict in Ethiopia: volume 722: 202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的辩论”。

⁴¹ 美国国防部，“平民伤害减轻和应对行动计划(CHMRAP)”，2022 年 8 月 25 日。

⁴² Airwars 及其他组织，“民间社会对平民伤害减轻和应对行动计划的指导(CHMRAP)——非政府组织的建议：2022 年 7 月”。

G. 对所受伤害的赔偿

65. 以下例子说明了民间社会如何能够支持国家履行向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受害者提供赔偿的义务。⁴³

66. 在以色列和北爱尔兰以及科索沃，⁴⁴ 民间社会利用伤亡记录怀念和纪念死者。例如，《失去的生命》一书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从 1966 年到 1999 年北爱尔兰冲突导致的每一起暴力死亡。书中包括 3,700 多人的姓名、死亡日期、地点、职业、宗教、年龄和婚姻状况，以及死亡情况的摘要。⁴⁵ 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称，这本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包括对爱尔兰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的影响，并使两个社区能够分担所遭受的痛苦。⁴⁶

67. 科索沃也有类似举措。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人道主义法律中心于 2011 年出版了《科索沃记忆》一书。⁴⁷ 该书列出了 1998 年至 2000 年科索沃 13,000 多名被杀害、失踪和下落不明者的详细情况，包括受害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地点、居住地以及死亡或失踪的日期和地点。这两本书的宗旨都是建立对过去的共同社会理解，促进和解，同时反击虚假信息和“种族民族主义记忆政治”。⁴⁸ 这两个组织还利用其伤亡记录，帮助受害者向塞尔维亚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提出法律申诉。迄今为止，已有 1,000 多名受害者在赔偿诉讼中得到援助。

68. 大屠杀纪念馆关于纳粹浩劫受害者姓名的中央数据库包含 450 万有名有姓的大屠杀犹太受害者的生活故事，有助于纪念受害者，帮助了数百名被分离的家庭成员团聚。⁴⁹

69. 在危地马拉和加拿大，伤亡记录被用来确定死者和失踪者的身份，并组织传统的纪念仪式，以支持受害者家属表达其宗教或信仰的权利。危地马拉法证人类学基金会收集始于 1960 年的武装冲突中伤亡和失踪人员的信息，并利用这些记录查找和识别受害者，以便他们的遗体能够归还给家人，并按照传统信仰以有尊严和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安葬。在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汇编了在寄宿学校上学时死亡的土著儿童的伤亡记录。这些记录使受影响的社区能够举行传统仪式纪念和缅怀这些儿童。

70. 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Airwars 组织发起了一个记录和纪念冲突受害者的项目。在与 Airwars 组织接触多年后，美国军方 2020 年公布了 340 起事件的准确位置，这些事件主要是由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造成的，在 2014 年至

⁴³ 获得赔偿的权利包括补偿和满足。除其他外，满足包括核实事实和公开披露真相；协助找回、辨认和重新安葬尸体，以及纪念和悼念受害人(《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第 18 和 22 段)。

⁴⁴ 凡提及科索沃之处，均应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244 号决议(1999 年)理解。

⁴⁵ David McKittrick and others, *Lost Lives – The Stories of th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ho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Trouble*, fourth edition (Edinburgh, Mainstream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⁴⁶ A/HRC/45/45, 第 62 段。

⁴⁷ Humanitarian Law Centre and the Humanitarian Law Centre Kosovo, *The Kosovo Memory Book 1998–2000: Let People Remember People* (2011).

⁴⁸ Every Casualty Counts 提交的资料，第 4 页。

⁴⁹ Yad Vashem, “The Central Database of Shoah Victims’ Names”.

2020 年期间，这些事件导致 1,000 多名平民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针对达伊沙的冲突中死亡。Airwars 创建了这些事件的在线数字地图，让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知道他们亲人的命运。⁵⁰ 美国军方的决定构成了其他军事行为者的透明度基准。

71. 伤亡记录也被用于指导赔偿。各国通常在民间社会和联合国的帮助下使用伤亡记录和“受害者登记”工具识别受害者，并为获得赔偿提供便利。例如，在墨西哥，法律规定了国家赔偿办法⁵¹ 并责成所有政府实体和部门向因打击有组织犯罪而遭受暴力罪行和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协助或全面赔偿。截至 2022 年底，包括直接和间接受害者在内的 5 万多人在州和联邦一级完成了登记。

72. 同样，萨尔瓦多的登记册载有 6,270 名得到正式承认的国内武装冲突受害者。政府正在执行美洲人权法院裁定的对 El Mozote 大屠杀受害者赔偿的方案，并部分利用了该登记册支持康复、满足和保证不再发生。

H. 将性别观点纳入分析和对策

73. 伤亡记录包含特定个人的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分类信息。当用于统计分析时，这类记录可用于识别歧视模式，并可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干预措施提供信息。例如，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根据地雷和集束弹药监测组织的伤亡记录工作，强调了地雷和集束弹药的性别影响。⁵² 分类数据显示，集束弹药和地雷造成的伤亡大多是男性，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规范，女性承担了主要的护理和经济责任。这一分析为受害者援助方案提供了信息，而援助受害者是条约义务的一部分。⁵³

74. 2015 年，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问题特别报告员呼吁所有国家建立一个“杀戮女性观察站”，或观察组织，监测与性别相关的杀戮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并通过公布受害者及其与犯罪人关系的数据支持预防工作。⁵⁴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一直在记录全球的案件数量⁵⁵，许多国际和国家民间社会组织一直在整理个案记录。除其他外，这些信息被用于要求各国履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尽职调查义务。

75. 在联合王国，自 2009 年以来，Femicide Census 组织一直在收集数据，包括人口和社会因素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被用于查明和减轻风险。⁵⁶

⁵⁰ Airwars, “The credibles”.

⁵¹ General Law of Victims of 2013.

⁵²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集束弹药公约中的性别和多样性”(2022 年，日内瓦)。

⁵³ 《集束弹药公约》第 5 条和《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第 6 条第 3 款。

⁵⁴ 特别报告员将杀害妇女或与性别相关的杀害妇女行为定义为“因生理性别和(或)社会性别而杀害妇女的行为”(A/76/132, 第 18 段)。

⁵⁵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妇女署，“与性别相关杀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杀戮女性/杀害女性): 2021 年私人领域与性别相关杀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全球估计数——改进数据以改善应对措施”(2022 年)。

⁵⁶ 2018 年，Femicide Census 编制了一份关于 2009 年至 2018 年在英国被男性杀害的 1,425 名妇女的分析报告，该报告为政府行动提出了详细的建议(Femicide Census, 英国 2009-2018 年杀戮女性事件(2020 年))。

I. 获得服务和满足基本需求

76. 伤亡记录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积极影响往往体现在促进受害者获得服务方面。例如，在阿塞拜疆，国家的《烈士和家庭法》为与冲突有关的死亡开具死亡证明提供了便利。为失踪人员和推定死亡人员获取证明提供帮助有便于家庭获得养老金、教育、医疗保健、就业和职业培训、住宿和建筑优惠贷款等福利。

77. 在乌克兰，人权高专办的平民伤亡记录有助于修改关于退伍军人地位及保障其社会保护的¹法律(2018年修订)。退伍军人福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包括因敌对行动致残的某些类别的平民。乌克兰人权监察团的伤亡记录使人们了解了平民伤亡的范围，这反过来又使立法机构对当时拟议的法律所涉预算问题有了更准确的估计。同样，在2021年接管塔利班之前，联阿援助团的平民伤亡信息支持获得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援助方案。

78. 2022年1月，人权高专办海地办事处和联合国警察建立了一个联合平民伤亡记录系统，记录包括帮派暴力在内的一般暴力造成的伤亡。这些信息以及来自其他保护事件的信息被用来创建暴力热点的动态地图。该工具有助于查实2022年太子港太阳城社区杀人和受伤事件激增的情况，以及帮派故意限制民众获得基本需求，包括紧急医疗保健、食物和水的行径。这些调查结果的公布引发了与主管机关的讨论以及主管部门之间的讨论，导致总理承诺向警方提供额外支持，以确保履行保护民众的义务。

四. 结论

79. 伤亡记录不仅仅是数字，所代表的是生活被冲突和暴力撕裂的人们。

80. 本报告显示了伤亡记录的多重人权影响，这些影响可以是直接的和具体的，例如在预警、人道主义反应以及防止军事行动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方面。长期影响包括更好地遵守国际标准，增加政治参与，以及问责、赔偿和获得服务。分类伤亡记录也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的干预措施。如果长期实施，伤亡记录可作为衡量变化的尺度，并显示冲突和暴力局势的严重程度和规模。伤亡记录是为了减轻伤害而与国家和武装行为体接触的切入点。因此，伤亡记录在保护、尊重和实现人权方面，以及在遵守适用的国际人道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81. 伤亡记录人员是人权维护者，他们经常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工作。他们的工作需要获取信息和大量资源投入，通常是在动荡的环境中核实每一个人的伤亡情况。因此，伤亡记录举措，包括民间社会的这方面举措，必须得到政治上和资源上的支持。便利和安全地进入发生伤亡的地区至关重要。

82. 伤亡记录应在暴力开始后立即开始，以可靠、透明的方法为基础，并持续下去，直到建立起死亡(和受伤)的全面记录。

83. 伤亡记录的行为体和方法的范围已成为其优势之一，有助于确保纳入多个独立的视角和来源。经验还表明，这种多样性会给各行为体之间有效共享和分析信息以及实施可靠的方法带来挑战，有可能降低这种工作的潜在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加强国际合作，共享和协调最佳做法，同时认识到各种背景、来源和目标的差异。

84. 伤亡记录工作的有效性和影响最终取决于与造成伤害的武装行为体和其他行为体的合作，以及政治领导人参与和从这种分析中学习的意愿。

五. 建议

85. 高级专员建议各国：

(a) 确保建立伤亡记录系统和政策，并公开报告所有据信由敌对行动或暴力造成的伤亡及其事发情况，包括赔偿和问责；

(b) 寻求并最大程度地利用伤亡记录人员提供的分类数据和分析，为保护、尊重和实现人权的决策和政策提供信息，包括用以问责、赔偿和预防伤害和侵权行为；

(c) 支持和促进独立伤亡记录实体的工作，包括确保准许实地访问和获取信息；

(d) 加强对独立伤亡记录工作的政治、后勤和资金支持，无论这项工作是由联合国、民间社会还是国家实体开展的；

(e) 确保使用伤亡记录支持查明失踪人员的身份。

86. 高级专员建议国家人权机构和国家统计局与人权高专办协商，利用个人记录和其他数据的信息以及对人权影响的分析，就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冲突相关死亡及相关官方统计的指标 16.1.2 开展合作并制定必要的报告模式。

87. 高级专员建议国际、区域和国家安全部队和非国家武装团体：

(a) 确保建立伤亡跟踪系统，并使用数据和分析结果减轻行动过程中造成的伤害，审查有关程序，并酌情推动进一步调查；

(b) 建立必要的渠道，以安全可靠的方式与伤亡记录人员定期接触，以澄清伤害平民或侵权的事件真相。

88. 高级专员建议人权理事会鼓励各下属机制利用现有的伤亡记录数据和分析，以便为理事会的评估和审议做出贡献。

89. 高级专员建议伤亡记录人员：

(a) 在安全和得到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公布方法、目标和结果以及分类调查结果确保透明度；

(b) 加强合作，整合伤亡记录以便更广泛地使用，包括在必要时征得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同意，以期扩大覆盖面，共享信息，最大限度地发挥对人权的影响；

(c) 为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国际商定的伤亡记录定义、原则和标准开展合作，以期统一方法和最佳做法，同时认识到背景和来源的多样性。⁵⁷

⁵⁷ Building upon the work of OHCHR, *Guidance on Casualty Recording*, and *Every Casualty Counts, Standards for Casualty Recording* (London, 2020).